

○
「美术考古学丛书」

美术考古一万年

【下卷】

阮荣春 张同标 刘 慧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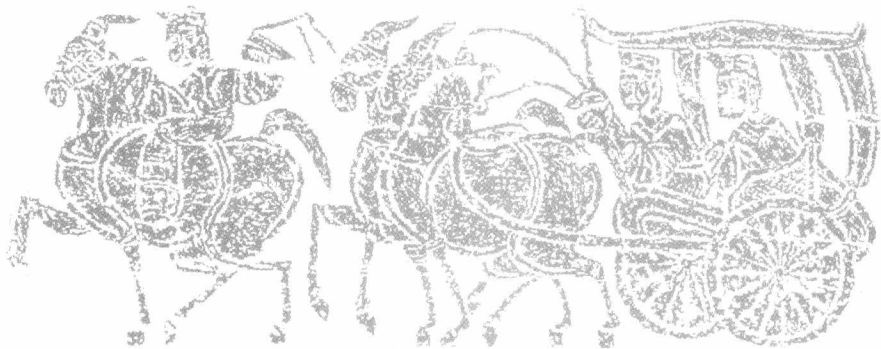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出版

「美术考古学丛书」

美术考古一万年

【下卷】

阮荣春 张同标 刘 慧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先秦书法艺术考古

谈论书法艺术,必然会涉及汉字的发展史实,必然会涉及文字的起源和初始形态。在传统史籍中,常会提到仓颉造字等传说,而今天的考古发现证实文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还有相当艰辛的取舍汰择以及传播普及的过程,诸如文字数量的由少到多、部族或地域之间的协调统一、音形义三者之间的内在规律,最终才会成为全体国民共同使用的记录符号。考古发现的一些符号,有象形的,有示意的,绝大多数难以确指音义,表明这些符号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仍有相当的差距,其中必然还有诸多尚未发现的缺失环节。殷墟甲骨文与商周青铜器铭文基本属于同一文字体系,但存在着镌刻与铸造等许多差别。相比较而言,青铜器铭文发展到西周时期,字形已趋于定型,体势在方圆之间,因为《史籀篇》的缘故,史称“籀文”,成为日后文字发展的新起点。

西周出现了不少铸造精美、文字精好、篇章较长的青铜器铭文,如大盂鼎、墙盘、大克鼎、小克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金文体势雄健、布白均衡、字形大小错杂,呈现出自然流动的艺术美感,对突破秦篆唐楷的板滞有很大的帮助,历来受到书家的重视。石鼓文自唐代发现以来,学者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考证其制作年代,现在根据不断发现的金文,认识逐渐统一,但仍有分歧。对于

学习和研究书法而言,石鼓文和金文基本上属于同一系统,相近之处很多,但石鼓文虽庄严端正,却稍显板正,恰好可由金文加以弥补。西周之后的文字,一方面逐步形成地域化风格,有楚越系、宗周系和中原系等大的类型,另一方面发生了为便于迅速书写的草率化,如湖北包山楚简、四川青川木牍、湖南长沙帛书等所示,文字学家称之为“隶变”,寓示着中国文字将发生重大变革。

一、萌芽状态的文字

中国书法艺术是依附于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对于文字的出现,中国古代曾流传有很多说法,如结绳记事、仓颉造字以及起一成文说等,记载在《吕氏春秋·君守》、《易·系辞》、《世本·作篇》等古代文献中。但事实上,汉字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并非像传说中所说由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发明或某个单一的因素所能产生的。

根据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发现,早在距今五千到六千年前,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记事刻划符号。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邠阳莘野、铜川李家沟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甘肃半山、马厂,青海乐都柳湾等马家窑文化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青海赵村等龙山文化遗址;以及浙江良渚,上海马桥、青浦崧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等,在出土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划符号,有些涂有朱红色或黑色颜料,有可能是早期的原始文字。

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刻符,一般均刻在陶钵的口沿上,其笔画简单而稚拙,都为横折竖折或交叉等,但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多是在竖画的直线上,增加不同数目的短横画。西安半坡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共有133件,各种符号共27种(如图3-1-1-1甲类)。临潼姜寨发现陶器陶片共129件,陶符也有30多种^①(如图3-1-1-1乙类)。故有学者认为是这些刻符应当是代表一些记数(记年记月)及其变异体^②,或可能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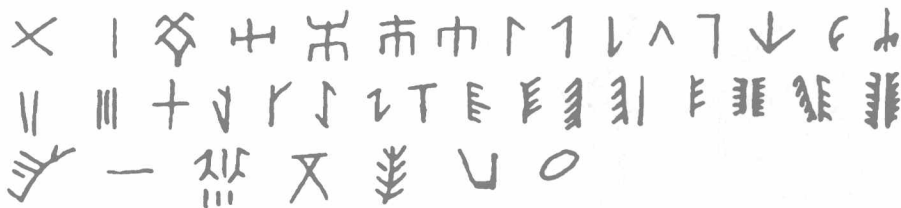
① 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② 刘民钢:《试论仰韶陶符》,《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③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甲类



乙类

图3-1-1-1 仰韶文化陶器刻符(甲类:西安半坡,乙类:临潼姜寨)①

甘肃省的半山和马厂两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早在30年代已经发现,其出土的陶壶和陶罐上,都有颜料描画的符号。1974年在青海柳湾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发现在殉葬陶壶的腹部或底部有涂画的符号,每个器物只画一个,共五十种之多②。风格与仰韶文化很相似,只是多了些圆形、三角和曲线。

关于良渚文化的陶器刻符的发现,在浙江余杭良渚镇、上海青浦崧泽、上海马桥等遗址均有数种陶器刻符出土(图3-1-1-2),可以看出,风格与仰韶文化刻符很接近,简单、抽象,线条更加富于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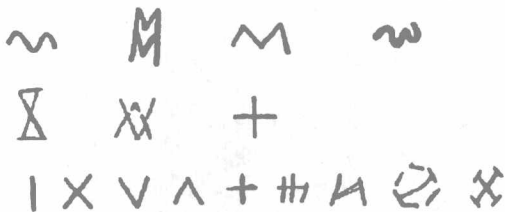


图3-1-1-2 良渚文化陶器刻符③

这种类似于仰韶文化的简单抽象的刻画符号,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到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发现陶器刻符多达24种④;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发现陶符15种⑤;山西侯马春秋时代晋国遗址,也发现刻在陶豆豆盘内外的陶符44种⑥。

① 刘民钢:《试论仰韶陶符》,《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②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③ 此图采自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5页。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5期。

⑤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⑥ 侯马市考古发掘委员会:《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2期。



图3-1-1-3 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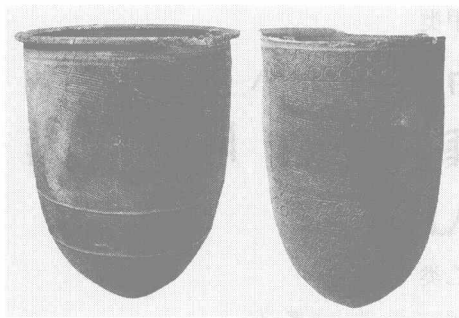


图3-1-1-4 山东泰安市刻符陶尊“斤”和“钺”
大汶口文化



图3-1-1-5 山东泰安市陶瓷刻符“旦”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刻文符号，在海岱地区主要发现于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和诸城前寨等遗址，如1959年山东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出四件灰陶缸，每个陶缸上都刻有一个符号(图3-1-1-3)，两个同于象形字，是按照两种实物描绘而成，可看成是甲古文中的“戊”、“斤”二字(图3-1-1-4)；还有两个同于会意字，是有两个以上物体符号组合而成，可视为“旦”字，其中在一锥形陶器的颈部上，刻有日、云、山组成的图案(图3-1-1-5)②，线条细劲，刻画形象生动，注意了整体与局部的对称稳定和平衡关系，富有美感，可算作目前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③。也有学者根据其特殊性将其称之为用于祭祀的“专用文字④”。类似这种结构的字体，在商周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也有发现，与铜器铭文中代表族徽的徽号文字非常相近⑤。可以说，即便这些文字不能称作中国的原始文字，对文字的产生

① 此图采自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② 启功：《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篇·商周至秦汉书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③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④ 张文：《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试解》，《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

⑤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发展,自然也是功不可没的。正如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所说的:“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①

1930年在龙山文化的历城城子崖出土的刻文陶片,内壁有8个刻划符号,刻划也极其简单,风格大同小异;1973—1974年,江西清江县吴城遗址也发现了大量陶文,有文字66个,刻在38件器物上,已经连字成句了^②。另外,1992年1月2日山东大学考古队在邹平县苑城丁公村龙山文化丁公遗址进行发掘时,民工整理陶片时发现了一块刻字陶片,是一件大平底盆底残片,陶片为泥质磨光灰陶,出土于灰坑H1235,长4.6—7.7厘米、宽约3—3.4厘米、厚0.35厘米。现存文字5行11字^③。右起第1行3字,其余4行各2字,刻文独立成字,笔画流畅,排列规整,刻写有一定章法,显然已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图画阶段。推测,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字有象形、会意的特征^④,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相比,丁公陶文更为进步,被学术界公认为原始文字^⑤。另外,龙虬庄遗址的刻文陶片(图3-1-1-6),是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其陶文内容完整,刻文笔画纤细,技法娴熟,左行四字,横平竖直,右行更像是四幅图形,酷似动物的侧面,可谓图文并茂,尚不能明确其含义,龙虬庄陶文晚于丁公陶文,且其文字系统与殷商甲骨文非常接近,对于研究中国汉字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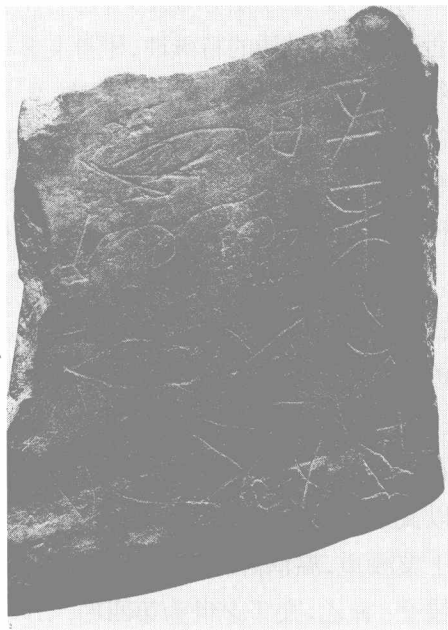


图3-1-1-6 高邮龙虬庄刻符陶片 龙山文化

①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② 史仲文:《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③ 王宇信、徐义华:《商周甲骨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3日。

⑤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统的来源,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唐兰先生说,“文字起源于图画”^①,这种孕育出文字的图画和符号最初“只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记的标记”^②。风格质朴,形象,表现自由且不失情趣。给我们研究三代文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依据和启示。

二、殷墟甲骨文与书法

商代是甲骨文发展的繁盛时期,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甲骨文记录的是其占卜内容,多为当时王室贵族祭祀、疾病、狩猎、婚媾或战争等方面的,龟甲多数为海龟的腹甲,也有用背甲的,而兽骨则多为牛的肩胛骨或肋骨等。由于材质的特殊性,甲骨文多以刀为笔,笔画劲利,其契刻方法也比较特别,先刻完竖画,再将甲骨旋转九十度用竖画的方式刻横画,再施以朱、黑等色。由于不同时期书写者的刻划手法、技术的差异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契刻风格。有相当大比例的甲骨文取象于现实事物,加以简化概括,其象形性特点相当明显,成为早期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甲骨文真正被重视是始于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经过解放前后多次考古发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出土的甲骨大概在15万片以上,可供研究的约6.2万片,整理出的单字是5 000多个,目前可识读的近2 000字^③。

董作宾根据卜辞中的“世系”、“称谓”、“贞人”、“字形”、“书体”等不同,在《安阳发掘报告》中将甲骨文书法风格划分为五期:盘庚至武丁为第一期,以武丁时为多,大字气势磅礴,小字秀丽端庄;祖庚、祖甲时为第二期,书体工整凝重,温润静穆;廪辛、康丁时为第三期,书风趋向颓靡草率,常有颠倒错讹;武乙、文丁之世为第四期,书风粗犷峭峻,欹侧多姿;帝乙、帝辛之世为第五期,书风规整严肃,大字峻伟豪放,小字隽秀莹丽^④。近年来,董氏的“五期说”受到相关学者的质疑,并提出新的以作品系之贞人的分组方法,即“两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②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③ 启功:《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篇·商周至秦汉书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④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王宇信、徐义华:《商周甲骨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07页。

系说”，使甲骨文的研究又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但董作宾的分期对我们认识甲骨文的风格特征仍有重要的启发，仍值得重视。

河南省安阳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图3-1-2-1），是一块商代武丁时期刻辞的牛肩胛骨，即属于甲骨文断代的第一期，该骨版长32.2厘米，宽19.8厘米，巨大完整，正面刻辞四条，100余字，背面刻辞两条，50余字，内有一条残缺，字内填朱，色彩鲜艳。其字形排列错落有致而不失自由变化。直的线条多，圆转的线条少，笔画粗壮，雄强有力，字体结构纵横开阖，富有气势，其书风的特点是用刀有力，雄伟劲健。已出现书法中章法与布局的意味。既是有关商代奴隶制社会生活和天文气象方面的重要资料。又是精美的书法作品^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残留的上古时期陶文刻符的影子，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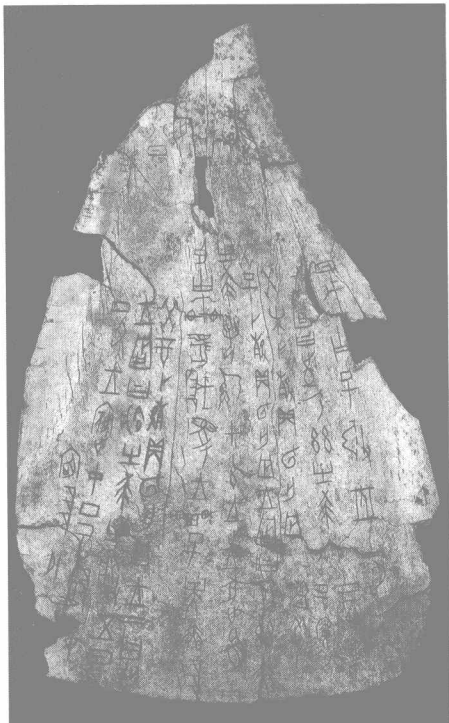


图3-1-2-1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商代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即商代末期，是甲骨文继武丁时期后再度繁盛的时期，所记之事繁多，文字刻划有力，疏密得当，布局严整，已经初步显露了书法艺术中对字的间架结构和整篇章法的经营理念。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一块宰丰骨匕刻辞（图3-1-2-2），长27.3厘米、宽3.8厘米，通体呈匕首形，正面刻有文字，反面刻有兽面蝉文，一端略有残缺，并镶嵌有绿松石，现仅残存十四颗，此骨匕两行文字，结构照应，笔画雄浑，字体布局稳重，精妙的间架结构，与奇变的章法、布局熔于一炉，为后世书法的间架结构和章法布局开了先河^②。该甲骨刻辞是该期遗存甲骨文的代表，恰如王羲之《书论》中

① 范世民、李荆林：《中华国宝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67页。

② 关显峰：《中国书法收藏与鉴赏全书》上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图 3-1-2-2 宰丰骨匕刻辞 商代



图 3-1-2-3 刻千支表牛骨 商代

所说“夫书字贵平正安稳”。风格类似的还有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殷契卜辞》165千支表(图3-1-2-3),其长22.5厘米、宽6.6厘米,铭文如军旅方阵,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方正而严谨。

商代甲骨文文字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两周,如1954年山西洪洞赵坊堆村,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1989年、1990年以及1997年在郑州商城、山东桓台史家等商代遗址,1979年在扶风县齐家村,1991年河北省邢台市南小汪,199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等周代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字^①,其字法结构与谋篇布局,在殷墟甲骨文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契刻技术更加娴熟、线条更加流畅、自由。

殷代的甲骨文已经是发展较为成熟的文字了,但尚属古文字阶段,异构

^① 王宇信、徐义华:《商周甲骨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7页;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字较多,象形字较多,部首也不统一,有些字有多种写法,还有一些合体字,部分涂有颜色,富有美感,即文字结构还尚未完全定型。当然,这种不定型,给文字书写契刻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使甲骨文字的形态、结体、面貌千差万别,增加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度。

三、青铜器铭文和书法

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又称“金文”、“钟鼎文字”、“吉金文字”、“彝器款识”以及“彝文”等。商代青铜器虽出土较多,但有铭青铜器极少,西周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青铜器铭文发展高度成熟的时期。周人喜用铭文来宣扬器主的功绩荣誉和地位,有不少是“以克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巩固统治种种政治事件或政治活动为背景”^①的长篇巨制。

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岐周”“宗周”“成周”三点为中心的地带。“岐周”是姬周的发祥地,在陕西扶风的黄堆、法门二乡与岐山经当乡交界地带,自清以来,许多传世重器都出土于此,如天亡簋、毛公鼎、散氏盘、孟鼎、克鼎、墙盘等;“宗周”是周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其王都和庙宇所在地,在今西安市西南12公里的沣河两岸,也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有铭青铜器,如孟簋、卫鼎、卫簋、吴虎鼎等;“成周”在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是西周王朝的一个军事重镇^②。除此之外,北京昌平、河北房山、甘肃灵台等地也都有发现。该期大篆书体逐渐形成,并规范化,自商到西周,青铜铭文风格演变大体上经历了奇肆的发展期、雄浑的成熟期和规整与放逸兼而有之的繁盛期。这里我们通常把西周又分为早期(武、成、康、昭)中期(穆、恭、懿、孝)晚期(夷、厉、共和、宣、幽)三个时期加以分析。

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受商晚期影响较多,字多肥笔,笔画多波磔,带有甲骨文的刀刻意味,因篇幅加大,使整体布局特点突出,风格华丽自由,在这段时期内,金文点画形式和结体方法基本不变,而章法有所发展,由原来的大小不一,参差跳跃,到康王时候的横平竖直,字距行距都均匀分布,并进一

①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② 陈槃:《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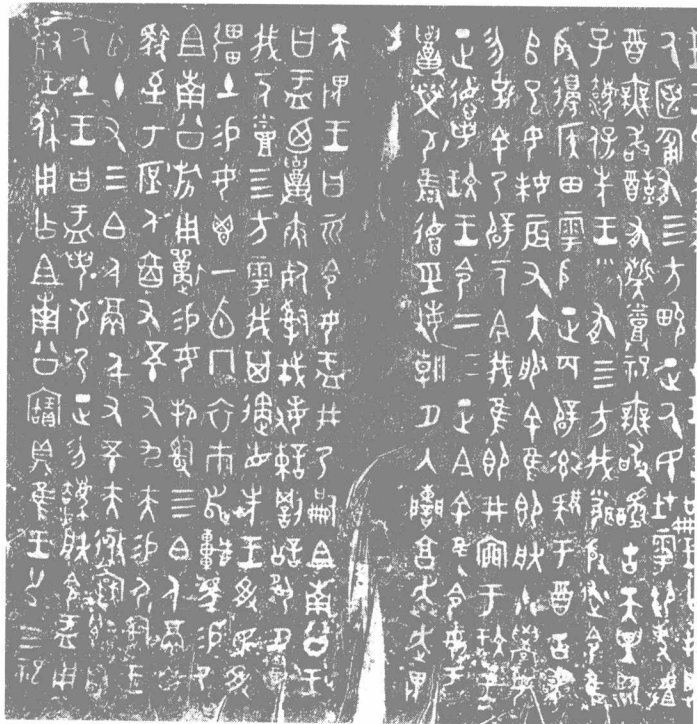


图 3-1-3-1 大孟鼎
西周早期

步淘汰了图像的象形成分,使之更加成熟^①。该期具有代表性的有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出土的武王克商时的利簋,多商人风格,而气质又柔弱谦卑;还有清道光年间(1820-1830)陕西省郿县礼村沟岸中出土的康王时期(前1020-前996)的大孟鼎(图3-1-3-1),器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公斤,经多人辗转收藏,于1951年由潘达于赠献政府,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其造型端庄雄浑,大孟鼎是该期铭文最长的鼎,291字19行,通篇章法规整,铭文体式方整,结构谨严,横平竖直,气度瑰丽高雅。

西周中期,不仅青铜器数量增多,铭文也多长篇巨制,线条式样与笔法已渐趋规范成熟,粗细均匀,首尾一致,重视曲线之美,用笔内敛均匀,极似后人所谓的“玉箸体”,通篇肥笔波磔减少,融入了作品自身的个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如1967年12月15日,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家村的一长方形青铜器窖藏中发现的恭王时的墙盘(图3-1-3-2),现藏于陕西宝鸡

^① 沃兴华:《中国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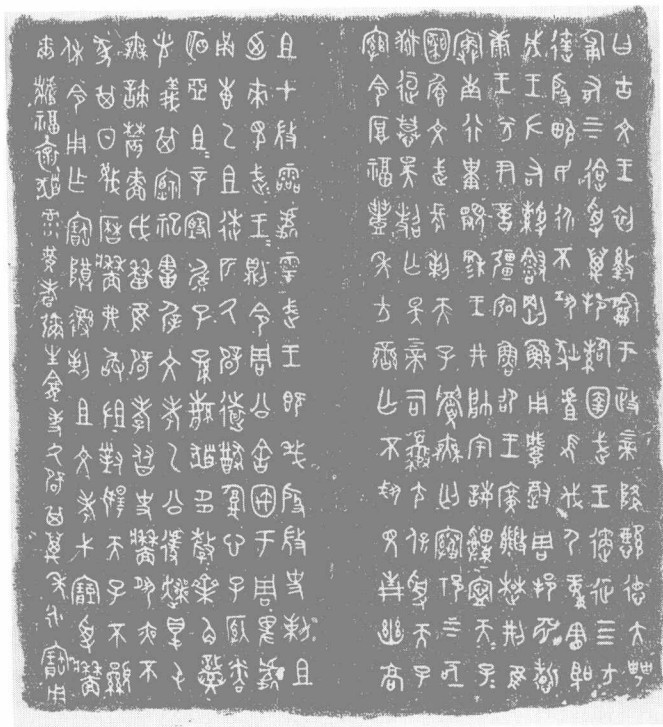


图 3-1-3-2 墙盘
西周中期

市博物馆,该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重12.5公斤,铭文达284字,记述西周各王主要功绩以及史盘一家列祖功绩^①,文辞华丽工整,用笔均匀细致,线条自然圆浑,字形长方,结体紧密,气势流畅而豪放,整篇整齐、端庄又不失清秀疏朗的气质,堪称众器中的翘楚;另外,同期还有大克鼎、小克鼎、六年琯生簋等,其铭文都是该期极具风格的佳作。

西周晚期是金文书法艺术最鼎盛的时期,其结体规律性更强,婉转流畅,精巧均匀,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都井然有序,具有苍劲古朴的书风,为秦汉书法奠定了基础。代表性的作品有厉王时的散盘、多友鼎,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毛公鼎以及共和时期史颂匜等,其中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散氏盘》(图3-1-3-3)高20.6厘米,腹深9.8厘米,口径54.6厘米,铭文为19行357字,记载散、矢两国和谈、划定界限之事,字形多呈方形或扁形,字体率意生动放逸,是西周金文中比较独特的一类,开草篆之先河;毛公鼎(图3-1-3-4),

^① 唐复年:《金文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2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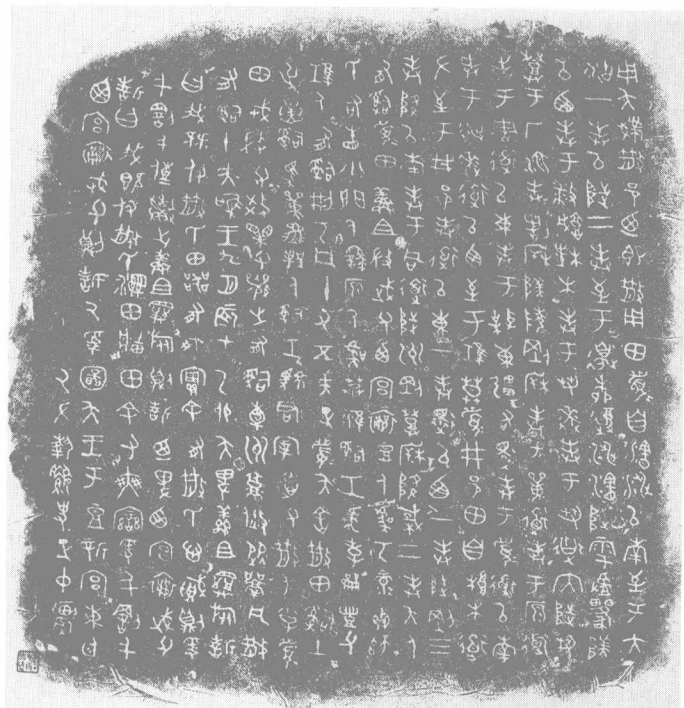


图 3-1-3-3 散氏盘
西周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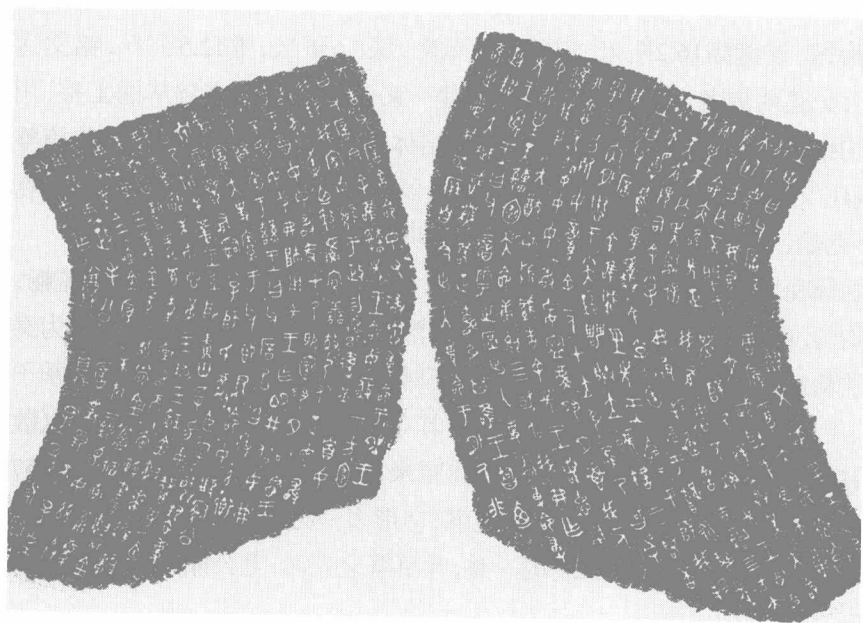


图 3-1-3-4 毛公鼎 西周晚期

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为宣王时期(前827-前782)的作品,其铭文32行497字,是目前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该器于清道光末年(1850年左右)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几经周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铭文分左右两幅,记载了周王对其主人的册命以及赏赐的器物,与大孟鼎有相似之处^①,其书法风格气势雄伟,可谓金文中的上乘作品。历代被奉为临写大篆的摹本。虢季子白盘(图3-1-3-5)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盘高39.5厘米,盘口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重215公斤,也是宣王时作品,据传是清道光年间陕西省宝鸡出土,为目前已经发现的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后由刘肃曾献给了政府,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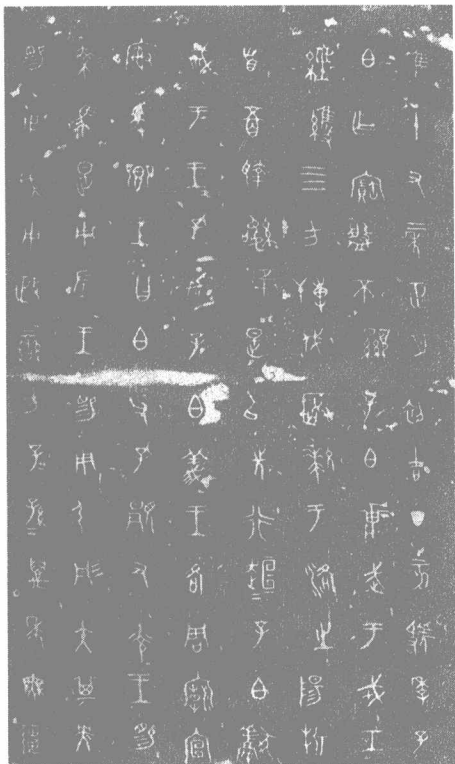


图 3-1-3-5 虢季子白盘 西周晚期

铭文8行111字,以韵文的方式讲述了子白立功受周王封赏的事情^②,其字形体式方正,笔画圆劲,字与行美观疏朗,极有可能是《史籀篇》大篆的基本样式。另外,2006年11月8日,在扶风县城关镇五郡村发现的一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出土了一些有铭青铜器,其中的五年琯生尊,腹内铭文113字^③,文字属典型晚期风格的佳作,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以及古文字研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研究西周晚期文字、族徽、铜器形制、土地宗法制度等都具有重大意义^④。2003年初,在陕西省宝鸡市杨家村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西周铜器窖藏,共出土27件青铜器。其中铸于西周宣王时期的迷盘共铸有铭文373字,字形美观,讲究章法,内容记述了迷先祖考的事迹、历代王世的史事,

① 唐复年:《金文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269页。

② 唐复年:《金文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284页。

③ 宝鸡市考古队、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县新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④ 王辉:《读扶风县五郡村窖藏铜器铭文小记》,《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及宣王对他的册命赏赐,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是1949年后发现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铜器^①。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成为东周之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兼并和战争持续不断,而该期文字却在这场战乱中出现了除旧布新、空前繁荣的景象,发生了极大转变。表现为:文字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地域性历史文化色彩的独立发展的新倾向;美化装饰文体大盛,鸟凤龙虫书等新书体流行;书写由注重内涵的朴质美逐渐转化为强调外在形式的优美,书法艺术的审美活动也因之变得更为直接、明快、活跃起来^②。书写性质由稳重和内敛逐渐转向外在的华丽,并走向通俗化、世俗化、普遍化、多元化和个性化,基于实用的自由、草率和简化成为促使书体演变的催生剂^③。

根据地域特色的不同,东周青铜铭文风格可分为三部分^④:东南以楚国为主的工整修长具有流动之美的书法风貌,如王孙遗者钟、王子午鼎、楚王钟、楚王孙渔戈、鄂君启节、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等;西面秦国继承了宗周文字的书风,如秦公簋、秦公镬等,以及北方中原地带,包括齐、鲁、燕、魏、宋、陈等国,主要是挺拔、瘦削空灵的书法风貌,富于变化,如叔夷镬、陈曼簋、中山王𠙴大鼎、栾书缶、赵孟介壶等。以下就个别重要器物详述之。

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楚贵族墓2号墓的王子午鼎,现藏于河南省考古研究所,鼎的器、盖皆有铭文,共14行84字,其铭文神秘而怪异,结体工整修长,线条弯曲而流动,具有随意增加的装饰性点画以及频繁改造的字形结构^⑤,是楚风的代表,亦是鸟虫书的鼻祖。鄂君启节(图3-1-3-6),共5件,车节3件,舟节2件,其中4件系1957年4月在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另一件为安徽蒙城王氏家族出售。战国中期楚国器,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六年)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青铜制成,形似剖开的竹节,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馆。为错金铭文,共计三百余

①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局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51-66页。

②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第3卷《春秋战国金文》,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③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④ 欧阳中石:《中国书法艺术》,外文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⑤ 丛文俊:《中国书法全集》第3卷《春秋战国金文》,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字,结体由长转圆,异常精美,富有装饰意味,具有浓郁的神秘而浪漫的原始宗教色彩。

传为1924年甘肃省天水县出土的秦公簋,秦景公时器物,高19.8厘米、口径18厘米,器内共有铭文123字,是用一个个单字模打在陶范上而后铸出来的,其铭文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因制作方法特别,通篇布局稍有散乱,但依然是东周秦国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与此风格相近的还有1978年在陕西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出土的一组春秋秦国时的秦公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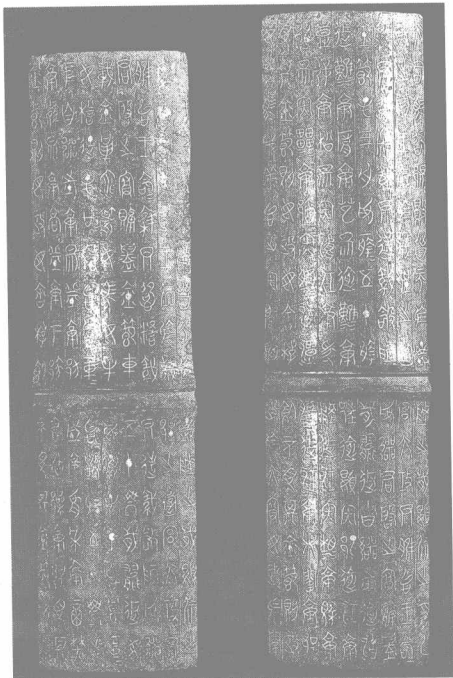


图 3-1-3-6 鄂君启铜节 东周

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

中山王𡈼大鼎(图3-1-3-7),鼎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重60公斤,铭文共77行,469字,为现存最长的战国青铜器铭文,字形修长,笔画纤细,两头尖锐,具有飘逸清瘦的美感,婀娜又不乏刚健,略带楚风,是金文中较为新颖的风格;栾书缶是1942年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于估人倪玉书处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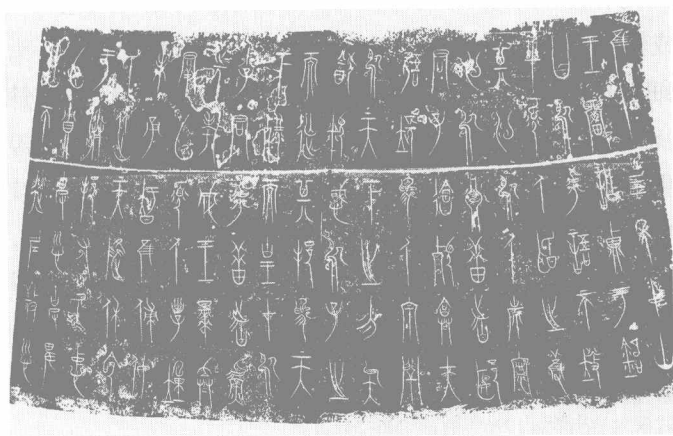


图 3-1-3-7 中山王𡈼大鼎 东周